

17 世纪蒙古高原巴尔虎蒙古族的 迁徙及其历史意义*

孔 源

【内容提要】 在地广人稀的中俄边境上，边疆人群对边疆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17 世纪巴尔虎人从贝加尔湖以南内迁至中国东北，这是蒙古高原东部最后一次大规模的部落迁移。整体迁移过程几乎牵动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历史，涉及到久居南西伯利亚的巴尔虎、布里亚特人、17 世纪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卫拉特集团和喀尔喀集团，以及大兴安岭与东北平原上附属于清朝的多个族群。东迁的巴尔虎人参与塑造了边疆格局，成为清代早期中俄交往中的边疆人群。巴尔虎人从迁徙到最终纳入清朝统治，是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疆整合的结果，也是清朝在黑龙江上游边疆地带加强统治、维护中俄边界稳定的结果。

【关键词】 东北边疆 巴尔虎 游牧民族迁徙 蒙古高原 中俄关系

【作者简介】 孔源，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

中俄两国从 17 世纪相遇起，就是陆地边境漫长的邻国。两国关系中的重要话题就是边疆安全，边疆安定亦是中俄关系平稳的前提。随着俄国的强大，乾隆盛世时“俾国书以晓礼仪，开市而归约束”^①的思路已经不合时宜。从清代的西北史地学派到清末改革家，从民国学人到当代学者，都在不同程度上关切清政府

* 这是青年学者孔源的遗作。孔源正当学富力强之际，不幸辞世，令人痛惜。他一直致力于早期中俄关系史和东北边疆史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见解独到之作，其中《佩特林使团访华问题新探：基于民族史材料的考证》发表于本刊（2018 年第 6 期），深获学界好评。此次所刊文章中，他考订了 17 世纪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巴尔虎人东迁和内附的历史，并论证此一历史事实之于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稳定的意义。孔源治学扎实，征引文献丰富。可惜的是，他没有来得及对这篇论文最终的修订和完善，特别是有些正文只加标注而留下了空白，有些注释标出了文献而没有详列出处。我们认为，刊载他富有价值的成果既有利于学术的推进，也是对他的最好纪念。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加以核查，尽可能使之完整，但有些不能查实的方只能付诸阙如。陈开科研究员帮助我们改正了一些舛误之处，谨致谢意。这篇文章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史视域下 17 世纪中俄两国早期交往的跨族群、跨大陆、跨文化特征研究”（19CSS033）的阶段性成果。

^① 松筠：《绥服纪略原序》（道光三年五月），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一辑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2 年，第 70 页。

是如何通过增加沿边地带军民数量的“实边”方式维护国家安全，保证中俄关系正常发展的。

在政治地理学意义上，国内外理论家也都注意到“人”的因素对于维护边界的重要性。拉采尔的《政治地理学》提到了政治边界与民族和文化的关系。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提出双重边疆理论，将内外之间的边境族群视为边疆稳定与否的重要力量。我国学者谭其骧^①和马大正^②亦提到中原地区与边疆地区各民族之间在经济、政治等各方面所形成的密切关系，以及少数民族对于边疆稳定的重大贡献。这已经成为了一种共识，即对边疆人群的有效管理是边疆稳定的重要基础。

在地广人稀的中俄边境上，边疆人群对边疆稳定起到的作用更加重要，清代呼伦贝尔周边就是很好的例证。这里是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最早确立的政治边界，但这里长期人口稀少，交通不便，自东北入关的清朝方面甚至对这一区域也不甚了解。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后，巴尔虎部落开始沿克鲁伦河一直东进嫩江流域，在给清朝地方官员造成冲击的同时，在客观上也强化了他们和清朝的联系。雍正十年，内迁嫩江流域的巴尔虎同索伦、达呼尔等族官兵移入呼伦贝尔定居，设立呼伦贝尔八旗。这对于沿边地带后来的稳定有着重要意义，对呼伦贝尔边疆完成转变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尔虎人从东迁到编旗的过程与中央政权对边疆的经营形成了互动关系，体现了边疆文化、边疆人群与国家整体历史间同与异的辩证关系，是清代东北中俄边界地区边疆开发进程的缩影。

对于巴尔虎人在边疆开发中的历史作用，近代东北官修文献给予了较高评价。但直至今日，对于17世纪巴尔虎人这样的处于政治边缘、经历多次迁徙的部落，以及他们对中俄边疆定型的影响，史学界的研究还并不是特别充分。同巴尔虎、布里亚特等族群关系最密切的俄罗斯，较晚才注意到呼伦贝尔巴尔虎人的相关问题。20世纪前期博尔斯基、巴兰诺夫、阔尔玛佐夫等人对呼伦贝尔状况的概述中，所述相关陈巴尔虎人的知识大体来自清朝方面的文献。民国时代东三省官员所编的《呼伦贝尔志略》《呼伦贝尔概要》等书在论及陈巴尔虎来历和民族属性时，试图将近代民族学知识同古典的族群描述牵连起来，其误解错谬更多。

相对而言，受中国传统考证史学与日本汉学传统的影响，学界对巴尔虎人内

① 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与历代疆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88年第3期。

② 马大正：《中国边疆学构筑札记》，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迁的具体历史关注略多。曾在实录馆任事的晚清名士周寿昌将其所见满汉档案与志书材料结合,撰文《巴尔虎事辑》。文中史料充实,在内迁巴尔虎领主及属下人丁状况、巴尔虎人变佐后的再次迁移与人口变化方面提供了大量信息。民国时期达斡尔族知识分子郭克兴辑录的《黑龙江乡土录》“巴尔虎”目下,从包括《巴尔虎事辑》在内的各类史志材料中整理了巴尔虎内附的相关汉文资料。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柳泽明先生自1999年发表《ホーチン=バルガ(陈巴尔虎)の起源と変遷》一文以来,就巴尔虎人在东北编旗编佐与文化同化的八旗化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专门论述。柳泽先生不仅对汉文文献的考证辑录了如指掌,更以满文见长,他补充的大量满文文献材料大大填补了巴尔虎内附史中的空缺。辽宁师范大学都兴智^①整体梳理了相关汉文史料,对17世纪巴尔虎人从贝加尔湖迁移至嫩江的历史框架给出了较为完整的概观。这些研究深化了学界的认识,也基本纠正了近代学人对1732年以前额尔古纳河流域中俄边界居民情况的不正确认知。

学界关于以巴尔虎人和呼伦贝尔为对象的边疆研究,往往基于自身的立场或利益。美国对东北问题的兴趣是从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开始的,20世纪20~40年代,拉铁摩尔等学者结合美国边疆学派思想,就东北的地缘政治撰写了一系列论著。在1949年“失去中国”之后,美国对东北问题的研究趋于零散化。当代民族学上的“想象共同体”观点与新清史之下由边疆观中原的视角,催生出新的专著论文。美国相关研究相互独立性较大,大多受拉铁摩尔以来的传统影响较深,关注包括关外汉人在内的东北不同族群的文化属性,但在涉及边疆与内地关系方面也常有偏见。日本和俄罗斯在近代历史上觊觎、侵略过中国东北边疆,其相关研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侵略需要而兴起的。为了给侵略正名,沙俄时期与日本二战前的研究往往极力论证东北地区并非中国实际所属,并大力论证其在东北利益的合法性。由于同东北关系密切,日俄两国对黑龙江流域史地、经济及文化的研究调查也颇为深入,为日后研究奠定了扎实基础。当今日本和俄罗斯学界对东北地区近代史的研究仍多为与历史上攫取利益相关的话题,如中东铁路、南满铁路、经济投资、侨民等问题。

总体看来,中外学者对巴尔虎内迁东北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其定居后的历史。有关整个17世纪巴尔虎人从贝加尔湖南迁黑龙江流域再至嫩江的过程,在历史学研究中还关注得不够。无论国内外,相关中俄边界地带的研究主题都可以上溯

^① 都兴智:《巴尔虎蒙古源流考》,载《内蒙古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到近代。当代国内东北边疆问题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然延续了晚清以来边疆史地的重要关怀。国外东北问题研究中的偏见，很大程度上也是近代以来列强侵略说辞的继续影响。尽管 17 世纪巴尔虎人东迁和内附并非热门话题，但在长时间尺度上仍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巴尔虎人在呼伦贝尔的活动，是同 17 世纪后期中俄定界和征讨噶尔丹前后巴尔虎人的东迁与内附是分不开的。这一区域政治边界从确立到稳固，离不开文化边疆的整合，而文化边疆整合又离不开自然边疆的跨越。因此，无论在早期中俄关系史方面，还是在清代边疆研究方面，这段史事都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一 大兴安岭边疆的意义与各族群的早期跨越

谈到 17 世纪巴尔虎人在边疆活动的意义，就要讨论呼伦贝尔边疆区域的早期特征。1949 年大兴安岭岭西的“呼伦贝尔盟”和岭东的“纳文慕仁盟”合并为呼纳盟^①，1953 年进一步统一为呼伦贝尔盟。在此之前，大兴安岭山区最艰险的北段在长期的历史中基本没有在行政上统合过^②。国内外学者集中对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地区的关注偏重于本地区，对《内蒙访古》及其他文献与之相关的两个宏观问题的关注则相对较少。由于巴尔虎人在蒙古高原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处于非强势地位，蒙古史研究对其关注也相对较少。17 世纪巴尔虎人的迁移在历史中并非不重要。内亚游牧世界的迁移几乎牵动了大半个欧亚大陆的历史，也是历史学家对内亚史的重点关注所在。对于内亚游牧民族和外部世界的关系来说，蒙古高原东缘的状况可以说是最不清晰的。从大兴安岭北端发源的民族，往往同时影响着草原沿线和东北地区。大兴安岭这条地带成了不同文明形态间的缓冲，也是蒙古高原同东北平原族群之间的交换孔道。东进的游牧者进入大兴安岭山间谷地后或成为东北平原的政治参与者，或沿大兴安岭西侧西进南下，参与到农牧交错带的政治风波中。鲜卑、室韦、原蒙古-靺鞨集团，元代至北元的东道诸王及其后裔各部，几乎所有的部落在大兴安岭一线留下的都是吉光片羽。相对来

^① 合并前的呼伦贝尔盟所辖地区包括今日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根河市、牧业四旗和海拉尔、满洲里两市以及牙克石的部分地区，纳文慕仁盟则以今日莫力达瓦旗、扎兰屯市、阿荣旗和鄂伦春旗一带为主体。

^② 呼伦贝尔盟最早在雍正十年作为呼伦贝尔八旗设置，清末至民国改设呼伦贝尔五翼总管旗、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呼伦贝尔兵备道。伪满洲国时期作为兴安北省，其行政中心始终位于海拉尔。近代形成的经济重心则在满洲里、牙克石、吉拉林等地。纳文慕仁盟的前身则是雍正十期在布特哈打牲部落基础上编制的布特哈八旗中嫩江以西部分，清末起徙治西布特哈旗，布特哈设置局。

说,17世纪巴尔虎等部落自贝加尔湖到嫩江流域的迁移几乎是这一地区民族流动最鲜活的例证。巴尔虎人在晚近时代的这次大流动,也能够为蒙古高原东缘族群活动模式提供了一定的佐证。

考察大兴安岭北部的历史,人们就会注意到另一个事实,即岭西的草原地带和岭东的嫩江右岸地区文化差异显得更大。大兴安岭山地的北部曾经是游牧民族的崇拜对象,“大鲜卑山”“额尔古涅—昆”的传说都出自这一地区。然而在考古学上,大兴安岭同呼伦贝尔却鲜有联系的证据。清代初期,有关呼伦贝尔的记载也很少出现此区域。同大兴安岭北部相关的史书记载与考古证据大多来自途经这一地区的迁移族群,如拓拔鲜卑、乞颜蒙古和阿鲁科尔沁诸部落。从史书所载的情况看,这些族群仅仅在此短暂停留后就折向西方或南方发展。这个事实恰好符合翦伯赞的“摇篮”“闹市”理论。1961年,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受内蒙古自治区邀请赴呼伦贝尔考察,当年年底他写成《内蒙访古》一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63年印行单行本。面对“锡尼河畔论英雄,万马秋风汗血红”的景象^①,他感悟到呼伦贝尔西部草原地带正是“游牧民族的历史摇篮”“武库、粮仓和练兵场”^②,遂总结为草原民族是影响北方历史的“后台”和“闹市”。巴尔虎人在边疆地带重要性的凸显,也是作为黑龙江上游的呼伦贝尔地区历史地理重要性的体现。17世纪之后,巴尔虎人驰骋在蒙古高原东缘、额尔古纳—黑龙江沿岸与嫩江流域,是推动草原世界同东北地区文化交往和人群流动的重要动力。

巴尔虎人在贝加尔湖一带活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古。学界许多人认为,巴尔虎的族称来自于汉文和鲁尼突厥文献中前蒙古时代的拔野古。最后作为蒙古民族集团之一部分出现的巴尔虎,最早的记载来自《蒙古秘史》中。秘史提到术赤征讨“槐因亦儿坚”所收服的部众中有“斡亦刺惕”“不里牙惕”“巴儿浑”等。拉施特《史集》也提到了“巴尔忽惕”,称他们居住在今日巴尔古津至色楞格河一带。对于早期巴尔虎人分布范围是否达到贝加尔湖以东至黑龙江上游地区的问题,有限的历史材料中尚无明确的信息。但《蒙古秘史》中的一个细节值得注意,秘史在提及术赤征服卫拉特、巴尔虎、吉尔吉斯等部落时,明确称其统领的军队为右手军。从《蒙古秘史》中的地理描述来看,其所分左手右手,大体上以成吉思汗兴起的三河源为界,以东黑龙江上游至大兴安岭称左手,大同至

^① 翦伯赞:《内蒙访古》,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27页。

^② 同上,第16页。

色楞格河以西基本上称右手。蒙元统治者同林木中各族交往路线大体沿色楞格河、安加拉河一线。巴尔虎人与豁里布里亚特最初都不是纯粹的游牧民族。无论从文化联系和生产方式上,这些群体距离典型的蒙古人都有一定距离。在北元时期,随着卫拉特贵族势力的扩张,部分巴尔虎人可能南下至漠南,明代《译语》就将“把儿户”视作北方大族,而巴尔虎的主体基本上仍留驻在贝加尔湖盆地。在俄国人的记载中,17世纪车臣汗部核心地带位于色楞格河与安加拉河流域,此处邻近萨彦岭南的卫拉特人。卫拉特史述称巴尔虎、布里亚特乃卫拉特一部。从17世纪早期俄文史料来看,布拉茨人同吉尔吉斯人、萨彦人、黑卡尔梅克等部族曾在1622年共同谋划进攻托木斯克^①。在后来称作外贝加尔的“达乌利亚”地区,17世纪初期尚不见蒙古人的身影。自16世纪末喀尔喀首领纳木汗起,17世纪上半期的蒙古高原进入了权力兼并时期。17世纪40年代时,喀尔喀右翼王公和卫拉特人结成了联盟。《蒙古-卫拉特法典》提到了将巴图特、巴尔虎和辉特人分别收纳到“蒙古”和“卫拉特”之中。

巴尔虎从卫拉特中分离,向东迁徙的历史较为模糊。据学者研究,巴尔虎人的东进和达延汗时代的政策有一定关系^②。至少到硕垒称车臣汗的时候,巴尔虎人开始更多地出现在黑龙江上游地区。顺治三年(1646年),硕垒在同清朝最后一次争斗中遣三子一孙率领“阿巴哈纳尔、巴尔虎、合答斤、兀良哈”^③四个爱马克的兵力自色楞格河流域前来迎战清军^④,1647年,叶尼塞哥萨克在车臣汗硕垒处打探消息,了解到“石勒喀河上……有蒙古人和布里亚特人游牧”^⑤,其下游方向分布着游牧通古斯人和达斡尔拉夫凯部落。由此可知,明清之际的巴尔虎人基本完成了东迁。

17世纪巴尔虎人脱离卫拉特联盟、自蒙古高原西北部的东向迁移是蒙古高

^① Русско -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1, 1607 - 1636. М., 1959, док. № 58, С. 114.

^② 关于蒙古高原东部巴尔虎人的来历,国内学界有观点认为在达延汗征服卫拉特时被纳入蒙古统治,依据为五八山只之母在《蒙古源流》中称为“卫拉特巴图特部 bayaryun 鄂托克阿刺丞相”的孙女(参见宝音德力根:《“喀尔喀巴儿虎”的起源》,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在《大黄史》《阿萨喇克其史》《金轮千辐》等后出史书中,已不再提及五八山只同阿刺知院的关系,对其父亲的称呼也变成了“卫拉特的克哩叶秃子”或者“卫拉特的秃子”。如果这个 Bayaryun 鄂托克确实是早期四卫拉特联盟中以巴尔虎人为主体的鄂托克,那么在后来的时间中可能已被冲散。又据清代史料和当代蒙古学者的研究,17世纪内迁的巴尔虎人及其后人中鲜见巴图特氏。在留居车臣汗部和自车臣汗部内迁的新巴尔虎中,巴图特氏也并非主要部落。

^③ 《清内秘书院》。

^④ 据齐木德道尔吉考证,此战地点大约在一带。参见齐木德道尔吉:《腾机思事件》,载《明清档案与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⑤ Русско -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2, 1636 - 1654. М., 1974, док. № 96, С. 316 - 319.

原东缘最后一次大规模部落迁移。整体迁移过程涉及久居南西伯利亚的巴尔虎、布里亚特人、17 世纪蒙古高原上最强大的卫拉特集团和喀尔喀集团，还有大兴安岭与东北平原上附属清朝的索伦、达呼尔、科尔沁等多个族群。东迁的巴尔虎人参与了蒙古高原东北部的复杂政治活动，最终成为了清代早期中俄交往中的边疆人群。

二 17 世纪巴尔虎人对大兴安岭边疆的进一步跨越

17 世纪巴尔虎人的东迁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巴尔虎布里亚特集团从贝加尔湖扩展到黑龙江上游，第二个阶段则是巴尔虎人从黑龙江上游到大兴安岭东部的迁移。两次迁移时空尺度不同，既是蒙古高原政治局势使然，也反映出高原游牧人群的一些特点。

转折发生在 17 世纪 60~70 年代。在此前十数年中，沙俄强化了对南西伯利亚散居部落的控制，硕垒的后人投奔清朝，而卫拉特与喀尔喀之间的矛盾、喀尔喀左右翼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17 世纪中期罗卜藏对卫拉特的攻击与其挑动的喀尔喀左右翼混战，使得大量人畜进入左翼地区，左翼势力开始增强。在混乱的局面中，部分俄罗斯与卫拉特的“收贡赋人众”或被喀尔喀贵族带走，或流向喀尔喀各部，或迁移到局势相对平稳的蒙古高原东部至黑龙江上游一带。从 17 世纪 70 年代起，靠近鄂嫩河流域的车臣汗部领主开始对季节移牧或流散到尼布楚周边的巴尔虎人进行收抚，巴尔虎和布里亚特人也扩展到了黑龙江的上游地区。

到 17 世纪 70~80 年代，布拉茨人的活动频繁出现在石勒喀和与克鲁伦河之间，清代官方记载中也更多地出现了自由游荡的巴尔虎人的身影。巴尔虎人最初的东进时间可以推测为 17 世纪 60 年代。17 世纪后期来自涅尔琴斯克的报告称，“蒙古的琿台吉（岱青琿台吉^①）聚集蒙古人将勃拉茨人强行带走，自 177 年到

^① 《俄蒙关系档案汇编》引用《蒙古游牧记》，将此处琿台吉释为车臣汗诺尔布的哥哥，车臣中右后旗首任扎萨克罗卜藏的父亲岱青琿台吉。入清后罗卜藏继承的牧地在“肯特山，东当喀鲁伦敖嫩两河源”。俄文原注释见 Русско – монголь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Т. 3, 1654 – 1685. док. № 147.

现今的 183 年^①，这些人已经成为了蒙古台吉们的贡民”^②。

至 17 世纪中期，随着乌拉特、四子部落、茂明安等部被清廷迁往阴山北麓，呼伦贝尔地区主要的活动族群转变为生活在黑龙江上游至贝加尔盆地的巴尔虎蒙古人。巴尔虎人仍然以游牧业为主，其游牧景观和之前阿鲁科尔沁诸部并没有很大差异。但是，巴尔虎人同黑龙江流域上游草原地带的联系似乎更强。1670 年米洛瓦诺夫出使清朝，从尼布楚出发首先遇到臣属于清朝的“托尔果钦”^③。学界一般认为“托尔果钦人”是达斡尔人，后附的顺治帝国书中提到“曾到石勒喀河捕貂”的“猎手”，“边民达斡尔人与久切尔人”^④所指应也是这个群体。在根河和海拉尔河之间是“跟随蒙古车臣汗的巴尔忽惕”^⑤，这也是俄国人较早明确提到巴尔虎这个词。1675 年西伯利亚衙门就中俄交通情况向外务衙门出具公函，明确称“俄罗斯君主的通古斯贡民居于尼布楚到额尔古纳河，车臣汗诺尔布的巴尔忽惕居于根河、海拉尔河之间，海拉尔河、札敦河到大兴安岭间有中国皇帝的托尔果钦人”^⑥。1675 年斯帕法里出使时，“从尼布楚到中国边界，几乎只有纳米雅尔人和巴尔虎人，游牧踪迹很多”。巴尔虎人已经广泛分布在海拉尔河下游，在札敦河也有他们的足迹^⑦。斯帕法里还特别提到了岱青琿台吉对外贝加尔“达乌利亚”地区的威胁。从 17 世纪 70 年代米洛瓦诺夫的记述和 1676 年斯帕法里记载的对比可以看到巴尔虎 - 布里亚特部落在大兴安岭活动的加强。

早期进入黑龙江上游地区的巴尔虎人大体出于迁移习惯或者游牧需要，还没有形成侵袭岭东的力量。1693 年，一群通古斯人在根河下游一带曾经向伊兹勃兰特使团兜售掠夺来的蒙古奴隶。据其所言，他们“夜袭十五个蒙古包……杀死了五十个年老的男人和妇女，留下了年轻人，作为俘虏劫走”^⑧。根河流域的湿地草原通常是游牧者的夏季牧场，老人妇女五十人的大圈子也符合夏季牧地的集中性。在海拉尔水系中，海拉尔河流域的植被条件要好于呼伦贝尔高原的核心

① 俄国使用的儒略历，以公元前 5508 年为历元，档案中出现的 177 年和 188 年两个纪年实为儒略历 7177 年（约公元 1669 年）和 7183 年（约公元 1675 年）。为简便起见，在沙俄时期档案中纪年千位数经常被省略。

② ЦГАДА, ф. Нерчинская приказная изба, оп. 1, д. № 3, лл. 31 - 34.

③ Русско - 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VII веке. Т. 1, 1608 - 1683. М., 1969, док. № 134, С. 273 - 274.

④ Там же, док. № 136, С. 276.

⑤ Там же, док. № 141, С. 287.

⑥ Там же, док. № 176, С. 327.

⑦ Там же, док. № 183, С. 353 - 358.

⑧ [荷]伊兹勃兰特·伊台斯、[德]亚当·勃兰德：《俄国使团使华笔记（1692 ~ 1695）》，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 1980 年版，第 164 页。

区。这一带的高草场尤其适合马匹繁育。呼伦贝尔草地类型景观呈现块状特征，海拉尔河以北的冷湿草地适合打草，而对蒙古马的采食与活动不利。呼伦湖周边地区草场适合羊群取食，而较不易承载马匹。尽管呼伦贝尔有其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这里可能并不是巴尔虎人长期的根据地。

17世纪80年代开始，巴尔虎人已经在蒙古高原东北部广泛活动。至少在康熙二十年（1681年）之时，“巴尔虎”出现在了官方档案之中。康熙二十年，皇帝谕明珠称：“乌朱穆秦等各旗蒙古，住牧于喀尔喀巴尔虎之间，先窃彼两地马畜，以致喀尔喀巴尔虎等，亦窃其马畜以报之。曩无盗贼时，驱马北至凉地，牧养肥壮，收回尽可度冬。”^①官方视角之下的游牧民族迁移和互动，往往被书写为寇盗。从这段最早的材料来看，巴尔虎人同乌珠穆沁之间的缓冲和交流地带极有可能是后来的达里冈爱地区。康熙皇帝对此作出的裁定是严明边界，“置汛设哨”。“汛”即是满文中的karun。当时乌珠穆沁已经是归附的内扎萨克，而喀尔喀同清朝的关系还是若即若离。因此这种严明边界主要是为了防范喀尔喀巴尔虎人，蒙古王公功绩表传的记录则称“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以所属巴尔呼人私掠乌珠穆沁部界，议增汛兵严防御”^②。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至十一月，上谕明确将“巴尔虎、纳木渣尔（纳米雅尔别称）、喀木齐汉人等”^③视为车臣汗所属。二十三年对尼布楚的调查奏报，又提喀尔喀巴尔虎人“时贩牲畜等物至尼布潮”^④。巴尔虎人在额尔古纳的活跃，可以被同期的俄罗斯史料证实^⑤。巴尔虎人迁入内境的问题并没有因禁令解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时，朝廷“覆准兴安后齐达齐牢地方禁止巴尔虎私进哨地游牧”^⑥，这也说明了这种新边界对于游牧人群的防御功用是有限的。

康熙二十七年，强盛的噶尔丹博硕克图逼近蒙古高原中部和克鲁伦河上游，车臣幼汗乌默客的亲族此时已经开始南下内附躲避战祸。乌默客的叔父纳木扎勒暂时居住到乌珠穆沁边外。“康熙二十七年倡议偕乌默客来归，授济农。上以乌默客幼，命纳木扎勒驻牧乌珠穆沁界外布哈和頼，距乌默客居一日程兼领其

① 《清圣祖实录》卷九十七，康熙朝二十年九月辛未。

② 《钦定外藩蒙古回部王公功绩表传》卷五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清圣祖实录》卷九十八，康熙朝二十年十月乙亥。

④ 《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康熙朝二十三年五月甲申。

⑤ 苏联科学院远东所等编：《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卷第三册），厦门大学外文系《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一翻译小组译，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33页。

⑥ 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理藩院·典属清吏司》，卷一百四十二。

众。”^①另一位叔父洪俄尔岱青则迁居到嫩江下游的扎赉特旗。洪俄尔岱青原本牧地在克鲁伦河流域，“嗣为琿台吉，驻牧克噜伦河之南穆垒和硕玛塔特诸界，以时入贡最恭顺。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掠所部……使臣未至，而喀尔喀败遁，悉至汛界。朕以乱尚未定，故留之未遣……寻命附牧札赉特界外琿图塔什海”^②。

透过表面的政治风波，我们可以看到游牧人群分裂重组的模式。蒙古帝国兴起之后，处于游牧文化同森林文化的交界地带的布里亚特、巴尔虎等族群经历了漫长的蒙古化过程。在漠北的卫拉特与喀尔喀部兴起时，他们更多地被卷入蒙古高原的政治风波之中。随着 17 世纪蒙古高原政治集团的东向运动，巴尔虎人又进入另一个游牧文化同森林文化交界地区——大兴安岭东麓的嫩江流域。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巴尔虎人则停留在克鲁伦河流域游牧。当呼伦贝尔新旧巴尔虎人以不同方式聚首时，其文化已经彻底分化。巴尔虎人的东迁过程最终形成了一个循环。这个循环过程的几个步骤都能反映出蒙古高原东部游牧人群文化进程的一些特点。蒙古和北元时代作为“林木中百姓”的巴尔虎人，很长一段时间扮演的角色都是游牧者的附庸、贡赋部落。在 17 世纪蒙古高原几个大政治实体兴起后，巴尔虎人才逐渐从外围部落成为喀尔喀贵族属众的一部分。这是游牧人群的浪潮式迁移运动在微观上的体现。格鲁塞、拉铁摩尔、巴斯菲尔德等学者对草原人群外迁过程的叙述，往往倾向于描绘一种链式反应的推拉过程。事实上，政治波动中不同规模与强弱的部落，所产生的地域运动倾向和“战略”趋向都是不同的。17 世纪作为不同贵族属民的巴尔虎及其他一些部落，既在时代浪潮推动下迁徙，又参与塑造着边疆格局。

三 噶尔丹东征引发的波动，稳定巴尔虎人对“内外边疆”的意义

第二次迁移是噶尔丹东征引起的民族迁移，这次迁移时间更短而过程更加剧烈。康熙二十八年时，噶尔丹对蒙古高原东部的侵袭催促着弱小领主一个接一个地被动迁移，试图向东内附躲避噶尔丹的贵族形成了滚雪球之势。“噶尔丹肆掠，岱青诺颜洪果尔因避居楚克地，巴朗亦徙牧色楞额河，近俄罗斯之地。巴朗先内附，至是岱青诺颜洪果尔亦携属七百余户来归。同族台吉诺木齐岱青，子齐巴克

^① 《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扎萨克多罗郡王纳木扎勒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② 《钦定蒙古王公功绩表传·扎萨克镇国公车布登列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额尔克，及鄂齐尔子达什敦多卜等相继至命。察珲多尔济辖之车臣汗部台吉额尔克绰克图，暨包尔呼巴特玛达噜噶，索诺木达噜噶等携属踵至，命乌默客辖之。”

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二十九年（1689~1690），噶尔丹东征车臣汗部，战事波及克鲁伦河中下游与乌朱穆沁北部的乌尔会河，导致了巴尔虎人的东进。进入嫩江的巴尔虎人是冲击大兴安岭东部地区的最后一波草原民族。始于康熙二十八年至康熙二十九年间的巴尔虎人内迁，直接来源为呼伦、贝尔、海拉尔等处。内迁后巴尔虎人分布地域涉及扎赉特、杜尔伯特二旗、齐齐哈尔周边，嫩江右岸之流诺敏河、济沁河等处。随着噶尔丹博硕克图在17世纪末的东征，蒙古高原东部的巴尔虎人和其他部落集体流散到了嫩江流域，最终相当一部分被同化，成为东北各城驻防八旗中巴尔虎佐领与呼伦贝尔八旗中陈巴尔虎人的来源。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农历九月十八日，将军萨布素咨文总管玛布岱，报称“未料到喀尔喀巴尔虎无由乱行纷扰，因此请将我两处大军置于诺敏河此岸、尼尔基噶善等处”^①。九月二十五日，兵部向黑龙江将军所下咨文中明确了这批人的具体情况和身份，称“喀尔喀人众五六千余陆续来至我索伦打呼尔地方”^②。其中，巴尔虎人部众情况也得到了注意，“额尔克绰克图等巴尔虎越索伦等人众牧地，践踏田地”。除巴尔虎人、喀尔喀人外，卷入此次迁移的还有其他部众，“又阿海岱青所属 togongut ulanggut 喀尔喀人众同索伦达呼尔混居，反乱而行”。随着对移入人群的更多了解，清朝政府大体上对内迁领主及其属众有了更明确认识。在当年十月达呼尔索伦总管玛布岱给扎赉特贝勒的咨文中，已经明确了随喀尔喀人前来的巴尔虎人身份，“额尔克绰克图台吉，把拉宰桑等至千余人”^③。“巴尔虎之额尔克绰克图台吉本身近千男丁，阿海岱青属众 togongud ulanggud 乌梁海喀尔喀足千男丁来近卡伦”^④。

此前内附的喀尔喀巴尔虎人集中在内属蒙古各旗的边缘，已然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离散社区。车臣汗部诸贵族在噶尔丹博硕克图的直接攻击之下纷纷溃败，其部众也就成了无人管束的力量，嫩江下游地区随即开始了动荡。前一年来归的洪俄尔岱青的部属就在这次混乱中成了朝廷眼中的入寇者。“二十九年以巴尔呼人肆劫，命尚书阿喇尼往缉，擒其酋，询知洪俄尔岱青及达赖宰桑为噶尔丹所掠，不获归，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奉天宁古塔黑龙江将军等行文册，第53页。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各项官员来文册，第336页。

③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奉天宁古塔黑龙江将军等行文册，第64页。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各部来文档，第323~234页。

洪俄尔岱青兄子罕笃代领其众，诏罕笃携众人科尔沁界附亲王沙津游牧，罕笃至，纵属肆劫，命阿喇尼遣之出界。”流散的巴尔虎、喀尔喀人首先逼近了科尔沁人的牧地。10月13日，达呼尔索伦总管咨请黑龙江副都统，报称“扎赉特蒙古亦催情出兵”^①。此时的巴尔虎、喀尔喀等移民，已经全面散布在了嫩江平原。

康熙二十九年的嫩江流域及其周边，游荡的喀尔喀巴尔虎人似乎处处可见。东迁巴尔虎、喀尔喀等人众的影响范围不仅覆盖了嫩江下游，也遍布在大兴安岭的两侧。从当年汇总的盗抢案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冲突的广泛性：

“达呼尔鄂理德牛录之布勒基德报来：至我地面下营贸易时，所带马匹、衣物皆被巴尔虎掠去；雅鲁阿巴巴尔盖牛录莫鲁庚等二人报来，回返达呼尔地方时马二匹牛一头被巴尔虎所掠”^②；“又将鄂罗斯人送去尼布潮，回程时四人中途打尖时，众巴尔虎人叫啸而来，马七匹被其所掠。”^③

这些在战乱中流散的巴尔虎、喀尔喀人众是面临被挤压危机的边缘者。大兴安岭一带正是处于清、俄、蒙古卫拉特诸贵族之间的界地，此时清朝在东部防范噶尔丹的备兵重点正在此地。在清朝大军向大兴安岭推进的过程中，游荡的巴尔虎人只能面临进一步的收缩。“又翁古惕、敖都尔、齐木齐格尔、喀尔喀等足七百男丁，不知其台吉去向，返去时受鄂罗斯、昆都仑博硕克图侵扰，暂驻呼裕尔地面。额尔克绰克图台吉属下巴宝等十一户为伙，离群留居索伦地面。”^④

回撤至传统夏牧场呼伦贝尔高原的巴尔虎人，面对的生存压力往往更大。康熙三十年（1691年），索伦达呼尔总管玛布岱陈述了迁移者回撤的窘境：“据称ulanggut 喀尔喀人众从前来至尔处，根敦等去岁同越兴安岭来至，足有百户自阿伦河源返回，在根河、开拉里河地方。因大雪，牲畜俱倒毙，无以为生。”^⑤

最终，流落到嫩江的巴尔虎人很快被政府收编。康熙三十年（1691年），萨布素请旨拨粮救济内附喀尔喀巴尔虎：“议得喀尔喀之事，其齐齐哈尔附近之呼裕尔、雅鲁、济沁等处暂居者，内有牲畜者尚可度日外，余牲畜殆尽者无可度日。”^⑥“暂居”用法的出现，暗示了清朝地方行政已经默认了这批喀尔喀巴尔虎人已属归顺状态。被救济的巴尔虎人开始融入清朝的管辖之中，他们中的大多数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哈番等来文册，第339页。

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各部来文档，第323~234页。

③ 同上。

④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各部来文档，第265~312页。

⑤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三十年索伦达呼尔总管等行文档，第250页。

⑥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康熙三十年各部来文档，第51~52页。

人被黑龙江将军收拢，逐渐在嫩江流域开始了新的生活。经过二十年同化过程后，许多巴尔虎人被分配到齐齐哈尔、讷漠尔、雅鲁河等地，编入索伦达呼尔之中，文化上也渐渐被同化。东进与震荡最终以平静告终。当内附的部分巴尔虎人于雍正十年回迁呼伦贝尔时，几乎已经没有了游牧者的特征，而留在喀尔喀地区的巴尔虎人也重新回到了同中央朝廷疏离的状态。巴尔虎人先东迁、后移居呼伦贝尔或驻防东北各地，在这个过程中中央政权将黑龙江上游草原地区的游牧人群整合到了统治秩序之中，各级官员同巴尔虎人的交往也使得清朝方面对游牧人群活动的黑龙江上游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虽然几经波澜，巴尔虎人的东迁终究使得朝廷重新意识到大兴安岭和嫩江一带的政治文化意义。清朝方面通过收拢巴尔虎与追剿噶尔丹，积累起足够知识，也认识到了从嫩江到呼伦贝尔高原的地理形势。1691年兵部奏请让科尔沁诸王公献出所属锡伯人，以此充实边防。这份奏议显示朝廷方面认识到大兴安岭牵连黑龙江和蒙古高原的军事地理意义，“齐齐哈尔为最紧要形势之地，蒙古、锡伯、索伦、达呼尔等所居地界总会于此，且距通达兴安岭北呼伦等地及尼布楚之道甚近……”^①。像这样的知识积累和此后清朝对蒙古高原东部及大兴安岭地区战略意义的认识，同巴尔虎人的跨区域迁移和跨文化互动的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巴尔虎人从迁移到最终定居的过程是政治边界和文化边疆整合的结果。

结 语

巴尔虎人从迁徙到最终纳入清朝统治的历史，同样也是清朝在黑龙江上游边疆地带加强统治、维护中俄边界稳定的历史。在1689年中俄确定政治边界的时候，沿边管理方式尚属粗疏，清朝官方对这一区域也所知甚少。对比尼布楚条约前后，清朝官民对呼伦贝尔一带的地理知识和战略意义了解水平的提升，很大程度上来自与噶尔丹在克鲁伦河的战斗以及与巴尔虎东迁部落的互动^②。原本“系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兵部为查询科尔沁王等可否显出锡伯等人事咨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文，康熙十年七月初三日，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锡伯族档案资料（上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年版，第26页。

^② 天命八年爱新国追击逃亡的科尔沁贵族时到达过黑龙江上游，但崇德五年皇太极给蒙古贵族的一封信件中似乎显示他似乎没有对巴尔虎部的清晰概念。清代初期对周边部落往往以国相称，如达海碑中所记。比较董秉忠康熙二十三年《盛京通志》和平定噶尔丹之后成书的《龙沙纪略》，也可以看出，清朝对今日呼伦贝尔的早期知识主要来自尼布楚条约前后巴尔虎人的东迁风波。

绝域微末之人”^①的巴尔虎也成了官员文士所熟知的呼伦贝尔本地族群。巴尔虎人的迁徙与族群互动也促进了沿边治理方式的转型。后来建立呼伦贝尔八旗时，朝廷采取的令官兵季节性移动的策略也可以说是一种游牧化。清代呼伦贝尔八旗长期以少数官兵维持边疆稳定的策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巴尔虎游牧人的机动力。《龙沙纪略》与《黑龙江外纪》记录的边民风俗，清末依然意识到巴尔虎兵丁可用的汉人官员，都表达了使用机动力强的本地游牧人群治理边境的策略。呼伦贝尔一带长期以来也是满汉旗民人数较少之地。面临俄罗斯境内各族群的经济渗透和人员越境，民国时期《呼伦贝尔志略》对游牧人群在维护边疆方面起到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20世纪中叶，学者还可以感受到边界地带的游牧民族在中俄关系中的特有作用。呼纳盟考察团师生感叹于国际交通要道的意义和族群分布的多元^②，几年后费孝通先生在这里意识到人口较少的巴尔虎蒙古族骑马奔驰守望边疆的机动能力^③。以巴尔虎蒙古人为代表的边境族群凭借对环境的熟悉、生产方式与社会组织方式的适应性，从清代以来在边疆开发中起到了重要的固边前哨作用。

作为形成于古代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近代的中国在列强环伺下于“民族主义”风潮中较大限度地保持了领土的整全，使得中国的民族—国家形态有别于西方典型的 Nation 概念，也使得近代中国的边疆民族关系难以简单化。近代以来中外学界对于近代中国内地—边疆关系的论述，经常容易出现两种偏颇倾向。一种将近代边疆历史单纯解释为“开化史”“汉化史”，将边疆开发过程等同于内地文化的植入。另一种将其作为“外藩”，视作同中国有别的边疆地区，将1949年前的几个边疆文化区域看作政治、经济与认同上独立于中国的实体。从巴尔虎人由疏离中央王朝到成为中央政权重要固边力量的历史来看，边疆族群基于不同动机的与中央王朝的互动，不仅是当地族群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共同体的过程，也是中央政权认识边疆的过程。在清代中俄关系史上，类似巴尔虎人这样邻近中俄边境，通过各类互动而与中原王朝有机连结起来的各边地族群，在现代边界管理制度形成前的百余年中，发挥了重要的固边作用，也印证了边疆稳定同族群互动的关系。

(责任编辑 张昊琦)

^① 《朔漠方略》。

^② 燕京、清华、北大一九五〇年暑期内蒙古工作调查团编：《内蒙古呼纳盟民族调查报告》，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费孝通：《话说呼伦贝尔草原》，通俗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